

述行与文学：从伊瑟尔和费舍尔-李希特谈起

李明明

(清华大学 外文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当代西方文论中,“述行”一词成为理解现当代文学艺术转向的理论关键词。少数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和耶鲁学派的述行与解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学者对述行研究的巨大贡献和推动却鲜有人关注。本文尝试从“述行”一词出发,重新解读伊瑟尔的代表作品,结合德国当代述行研究专家费舍尔-李希特的“身体述行”视角,重点探讨述行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文学文本到底有何述行特质?阅读行为为何也是一种述行行为?文学审美体验的述行性何在?最后,在认识与经验遭受质疑的今天,“述行转向”能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方向?

关键词:述行;身体;伊瑟尔;费舍尔-李希特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6-0055-09

0 引言

1956 年在 BBC 的一次广播演讲中,英国牛津学派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为他的造词行为所引发的不安展开安抚:“如果您不知道 *Performative* 所言何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新词,有些不怀好意,但也无伤大雅。不过有一点是十分确凿的,那就是它听起来毫无深度。”(Austin, 1986:305)“Performative”(述行的)这一概念是奥斯汀 1955 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系列讲座“如何以言行事”中首次提出。奥斯汀本想以此嘲弄喜好艰僻之词的哲学同行,岂料不出 20 载,“performative”迅速溢出语言哲学的框架,渐次成为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戏剧、艺术等研究领域极具启发意义、亟待讨论阐发的理论关键词。20 世纪 90 年代,在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反思和讨论大潮中,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柯瀚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著名学者提出以跨学科的“文化学”(Kulturwissenschaften)取代传统的“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概念(Frühwald et al., 1996)。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个案中,学者们发现,“述行”一词已经成为“文化学的统涉性概念(umbrella term)”(Wirth, 2002:10),研究视角上也出现了所谓的“述行转向”(performative turn)(Bachmann-Medick,2014)。

如此看来,“performative”并不如奥斯汀所述,是一个“毫无深度”的字眼。与之相反,不纠缠于事实正误,不执着于意义深浅,不囿于既成现实,不拘于个人意图——一种对阐释的反感姿态若隐若现。它试图挣脱语言符号编织的意义织物,转向行为的现实构建性,以身体的共同在场作为感知与经验的前提,在建构的当口埋下颠覆的潜能——这些与生俱来的特性使其成为突破“本体论”和“认识论”局限的新的可能,可以说,一场哲学领域的革命悄然而至。

1 作为言语行为的述行

关于“述行语”概念的革命性突破,美国文学批评家乔纳森·卡勒(Culler,2000:506)总结道:“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本质上是对于事态如何的陈述;与之不同的是,奥斯汀阐明了一种行动的、创造性的语言功能。”

收稿日期:2019-08-05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戏剧’审美功能与感知模式的转换”(15WYC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明明,女,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后戏剧”和德语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奥斯汀引入“述行性”概念,区分出两种言语类别:一种是描述状态、陈述事实或者发表声明的述愿语(*constative utterance*),它指向既存事态,有真假对错之分;另一种则是能够完成一个行为的述行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它不属于再现事实,无真伪之别,而是通过言说,展开一个行动,完成一个行为,创造出新的现实或者改变先有状态。德国述行文化研究专家费舍尔-李希特(*Fischer-Lichte*, 2013: 38)由此总结出述行语的两个特性:“自我指涉性”与“现实构建性”。述行语具有自我指涉性,所述即所行,所行即所指,而不指向言语之外的先在事实与意义;述行语具有现实构建性,现实在言说过程中生发,作为言说的结果得以最终呈现。这两个特征贯穿于费舍尔-李希特对各种述行形式的考察。

述行语不讲真伪,但论成或不成。述行语若要成功有效,即改变或者创造事态,按照奥斯汀的说法,不仅要满足一定的语言条件,更重要的是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性、机构性等非语言条件:

(A. 1)必须经由某种普遍的、约定俗成的程序产生出某种约定俗成的结果;包括某些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条件下说出特定的话语。

(A. 2)在某个具体事件中,相关人员和条件必须符合特定程序的要求。

(B. 1)所有参与者必须正确地、

(B. 2)完整地执行整个程序。(Austin, 1979: 37)

这些非语言条件中的几个核心要素对于之后述行理论的发展至为关键:

(1)“约定俗成的”。述行语的意义和效应虽然指向未来,具有现实生成性,但其生成条件,却是在既定的历史框架内,符合一定成规的。这一点为之后德里达和巴特勒的理论发现埋下了伏笔。德里达发现,述行语的构成就是引用例证,重复一个公认用法或者可重复的形式,受制于语境和惯例逻辑。巴特勒认为,述行就是不断重复、有例可循的身体实践,因此性别并非天生,而是在身体上“做”出来的。

(2)“程序/过程”。程序肯定和约定俗成密不可分,同时也揭示了述行与仪式之间最隐秘的关联——由过程导向结果,导致形变(*Transformation*)。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盖纳普在《过渡仪式》(1909)一书中揭示了仪式的三个阶段:分离、阈限、再融合。贯穿来看,这三个阶段就是一个主体形变的过程,也即仪式的意义之一(van Genepp, 2004)。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斯坦利·J. 汤比亚在奥斯汀的述行语概念的直接启发之下,发表了代表仪式文化研究“述行转向”的重要论文《对仪式的述行探讨》(1979)。他把仪式看作一个述行行为与过程,其意义已经超越了语义层面,更多取决于由程序性行动和综合媒介(如音乐、歌曲)所产生的效应,以及最终导向的个体与集体的形变结果(Tambiah, 2002: 210-242)。述行研究与仪式研究一直处于相互启发参照的关系。

(3)参与者。述行并不只是作用于个体的身体和形变,而是“所有参与者”,它以集体为前提,身体的共同在场成为述行行为发生的重要物质前提。因此,述行是一种社会行为,潜藏着构建、巩固、形变与颠覆的力量。而且参与者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方,他同样具有生产性,每个参与者的行为和决断都会导向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述行的结果和效应是开放的,具有一定的偶发性,述行理论的这一发展态势显然超出了奥斯汀设定的稳定框架。

(4)执行/实施。言说即行为。奥斯汀在后期研究中发现,“述行性”是普遍存在的。“述愿语”也完成行为,是一种隐蔽的“述行语”,两者之间的绝对区分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以“述行性”作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的三分论:以言陈事(*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奥斯汀的语言哲学不再把语言看作一个静态封闭的符号系统,而是在言说行为中产生意义的动态过程。述行语被置入具体的日常语境和场景,分配给相应的功能性角色,述行语被作为某种社会行为执行实施的过程,也显示出其展示与表演的戏剧性特征。述行语这一概念将意义从符号和文本的层面,转移到行为、实践和表演的层面,由此看来,述行理论最先在仪式、戏剧、舞蹈、行为艺术等与身体相关的研究领域得到响应和实践,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就连这一点,也是远远超出了奥斯汀所愿。以戏剧、文学为代表的虚构艺术被奥斯汀(Austin, 1979: 43-44)明确排除在言语行为理论之外,他认为发生在舞台上、诗歌中的言语行为是“非严肃的,空洞的……是对日常话语的寄生性使用”。

2 文学的述行性

奥斯汀将言语行为二分为“严肃的/非严肃的”对立等级,文学话语因其非严肃性、寄生性而遭到排斥。这组二元对立如同“言语/文字”一样,最终也没能逃过解构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拆解,他认为此种区分隐含着视言说者意图为言说意义之来源的逻辑斯中心主义的偏见。

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1971)一文中,用“重复性”(Iteration)回应奥斯汀提出的文学话语的“寄生性”问题。他认为,所有述行话语之所以能够完成所指行为,就是因为它们在“重复一个已有的公认用法,或者某种可重复的形式”,即“一种引用例证”(Derrida, 2001: 18)。普遍的重复性意味着无限引用的可能,从而引发语境的不确定性和再生性:“每个书面语段都可以被嵌入其他链条,或者被从中抽取出来。任何语境、编码都无力横加阻拦。”(Derrida, 2001: 27-28)因此它们“可以与给定的语境一刀两断,以一种永不知足的态势,源源不断生产出新的语境”(Derrida, 2001: 32)。在德里达笔下,符号开始了一场永无休止的逃逸与变异的游戏。每一次被引用、被重复都赋予符号新的差异值,助其在延异的运动中,从先前的意义和语境空间跳脱出来,开启改变与创造的新的可能,语境的边界被无限开放,意义也就不可穷尽了。如同字母a闯入 différence(差异)之中,生成 différance(延异)这一新的概念——这既是德里达的命名之举,又是“延异”一词指向自身的演示行为。此外,拆解与重组的行动生成了新的概念,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它都是述行的。

德里达所理解的述行的秘密就潜藏于符号的可重复性和可引用性之中,而不是某个一次性的言说行为。作为“重复性”的述行就是基于符号的无限推延运动,符号在永不止息的再语境化运动中,创造、位移、掩盖甚至颠覆意义,与之相伴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是无法控制的,也不受制于作者的意图。不难看出,这其中就蕴藏着文学述行话语独特的创造性、颠覆性及暧昧性。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所论述的颠覆与拆解的解构行动并不来自于人,而是文本自带的属性:“中断、歧义、悖谬、沉默、空白”,正如文化研究理论家卡瓦拉罗(Cavallaro, 2013: 26)所补充的:“解构并非某个人要对文本做什么,而是文本自己对自己做了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德里达对文学述行的理解并未止步于文本内部的符号运动和文本自带的解构属性,而是进一步将其置于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转换边界。在《文学行动》一书中,德里达通过大量的文学例证,论述了文学话语与现实话语之间相互引述的关系:与自诩传达真理的科学话语和哲学话语相比,文学话语绝少掩饰自己的虚构性,它参照遵循现实的规约,但又脱身现实的语境,成为一种“虚构的建制”;另一方面,“这种虚构的建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这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它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德里达, 1998: 4-5)。文学话语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由言说的民主原则,因此不应该仅仅被看作乌托邦式的虚构游戏,而是施展出质疑与动摇社会现实的作用力,这就是德里达所揭示的文学话语的言外之力——解构之力,而其解构主义的伦理政治意图也就不言自明了。

德里达对述行的阐发远远超出了言说行为理论的框架,继而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初与奥斯汀弟子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之间那场有名的论战。在这之后,述行概念以更为解放的姿态,超越造词者奥斯汀的所述与所愿,突破语言的囚笼,进入以身体和感知为前提的阅读行为、性别行为、表演行为等领域,为文学、戏剧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带来重大的范式转换。

文学批评家们也逐渐接受了述行这一概念,认识到有一些语言就是不甘于描述现实,而是要建构现实;不甘于做意义的中介,而是要展现自身的美与复杂;不甘于静默地停留在书页上,而是要进入身体,行动起来。这就是“始终想要做些什么的”文学语言,卡勒(Culler, 2000: 507)将它的企图称为“文学行动(literary as act)”。在卡勒(Culler, 2000: 506-507)笔下,它们似乎具有造物主般的神力:“文学话语也在几个方面创造了它所指的事态。首先最一目了然的就是,它创造了角色和他们的行为。第二,文学作品似乎带来了它们所运用的思想和观念。”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具体行动,它不仅创造了作品这个最终现实,而且在它的每个句子、每处细枝末节中,都有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显现,在发生,卡勒(Culler, 2000: 516)

把自己的立场戏称为“奥斯汀视角下的文学事件(literary event)”。不过,他把文学作品的述行性完全锁定在文本内部,而将其实现的重要前提阅读行为排除在外。

谈及阅读行为,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功不可没。发现读者,揭示以读者为代表的主体理解过程,或曰现象学视角下意义的生成过程——对伊瑟尔理论贡献的认识大多集中于此,其思想发轫一般也被直接归于师承——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对话阐释学与英伽登(Roman Ingarden)的现象学美学。其实重读他的早期作品将会发现,奥斯汀的“述行”概念是另外一条不容忽视的引线。

在《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1976)一书中,伊瑟尔(Iser, 1984: 87-89)直接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模式”和“交流结构”出发,探索虚构文本如何施展审美效力,秘密之一就隐藏在对规约的组织原则里。他认为,奥斯汀所描述的日常话语的述行力以规约和程序为保障,它们具有由某种纵向结构支撑的稳定性。此种纵向结构其实是一种时间维度的考量:之前有效的,现在仍有效。但是“虚构性言说(die fiktionale Rede)”却与此不同,它“对规约稳固不变的效力产生怀疑;它打破了规约纵向稳定的效力,又从横向的角度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Iser, 1984: 100)。也就是说,虚构性言说从早已存在于历史和生活中的规约库存中选取材料,以不可预料的方式把它们横向拼接起来。对熟悉的现实和规范的引用,是文本与读者交流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后果是这些规约一旦被从历史与情境所编织的纵向结构中剥离出来,便失去了功能和效力,其合法性进而沦为文本质疑与揭示的对象,形成一种对立、否定和反叛的文本结构。伊瑟尔(Iser, 1984: 87-89)把这一过程称为“去实效”(Entpragmatisieren):“去实效实为它(虚构文本)的实效层面。纵向排列的规约助力我们行动;横向组合的规约则让我们看清,每一步行动背后受到怎样的操控。”这是虚构性言说的文本策略,它与日常言说行为保持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明为引用,实则去效,而它的态度或意图就隐藏在选择和组合的原则中,这通常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制造一种熟悉的陌生效果,超出读者的期待视野,召唤读者去发现,这就是伊瑟尔反复论证的文本与读者之间独特的交流结构。用伊瑟尔(Iser, 1984: 101)的话来说,这一交流过程具有“述行性(Performanz),因为寻找不同规约的参照框架,就等于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因此,从虚构文本的角度而言,其述行力就在于:“对规约进行横向组织,运用策略打破期待,由此获得某种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它作为一种潜在效力,能够唤起接受者注意,左右他进入文本的方式,促使他做出反应。”(Iser, 1984: 101)

如果说德里达论述的更多是写作的述行性,那么伊瑟尔则通过揭示文学文本内在的述行特质,将接受的重心从探求确定意义转移到追问未知效应,从以文本为中心转移到以行动为中心。读者作为文本的述行对象,同时又是阅读行为的述行主体,被纳入观察的中心,即伊瑟尔所称“文本结构的读者角色”与“有结构行动的读者角色”。如同大家所熟知的那样,《阅读行为》全书反复论述了文学文本如何通过空白、否定、裂缝、不确定等因素,向读者隐现自身,若即若离,这其实就是文本面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结构与肌质的表演过程;展示阅读中的读者又是如何通过游移视点,与文本不断展开商榷对话的过程。对于伊瑟尔而言,文学的述行性就隐藏在文本与读者之间躲闪、碰撞、猜测与锁定的互动交流过程中,读者在其中扮演着创造性的角色,而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有待在阅读中生发。因此,从《阅读行为》一书中已经出现,但未引起关注的“述行性”一词出发重读此书,将会发现文学阅读活动的双重述行特征:文本的述行与读者的述行。隐藏其中的文学理论的“述行转向”与伊瑟尔所推崇的文学趣味的现代主义转向不谋而合。

读者的述行性不仅潜藏在与文本互动、助生意义的过程中,也体现在作为感知主体自身的构形与变形过程里,而这一切都始于身体。“身体”或“身体性”在伊瑟尔的论述中并未涉及,它在上世纪末才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身体视角的介入有助于延续伊瑟尔对阅读行为述行性的思考。根据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对阅读史的考察,出声朗读是书面文字出现之初的一般规范,有助于保持专注,避免默读可能引发的白日梦。随着阅读的个体化趋势的增强,对私密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默读因为保证了个人体验的隐秘性才逐渐成为普遍的阅读行为(曼古埃尔,2002:51-70)。当读者选择或坐或卧,或默读或吟诵,始于身体及感知的阅读行为便开始了。正襟危坐的身体将专注力一同绷紧,松懈的身体使专注力开始

盘旋,卧倒的姿势彻底卸下专注力的戒备,为想象和梦境提供温床。当然,就像卡尔维诺(2007:7)小说中的叙述者所感叹的那样,“理想的阅读姿势是找不到的”。读者的眼睛是经受过阅读训练的视觉器官,它们习惯了规范的文字排列形式,它们是专业熟练的文字解码器。因此当恩斯特·扬德尔(Ernst Jandl)在具象诗中混入图像与声音,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拼贴诗呈现出非匀质的文字外观,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后戏剧”剧作如小说般一气展开,这些先锋实验的文本给读者带来的首先是视觉感知上的冲击,随后才是意识的参与,它与身体一起浸入字符展开的世界。

伊瑟尔对阅读过程的观察仍然是从意识和理解的角度,而费舍尔-李希特(Fischer-Lichte, 2013: 138)则选择她所擅长的身体视角,强调阅读作为一种身体述行的物质性内涵:“读者将所读内容据为己有——他把小说‘吞入’腹中,与其合为一体。由此看来,阅读就是一种合体(Inkorporation)、入体(Einkörperung)与赋体(Verkörperung)的行动。所读内容成为读者身体的一部分,可能在体内引起生理性、情感性、动能性反应。阅读行为就是一个身体过程(ein leiblicher Prozess)。”读者的述行性不仅存在于伊瑟尔所揭示的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游戏中,也体现在由身体出发、经由身体进行、最后发生在身体之上或之内的形变;这不仅是发生在意识层面的纯粹智力性活动,也是实实在在、可感可见的身体-物质性过程。在费舍尔-李希特的隐喻性描述中,似乎透露出阅读与性欲的隐秘关联。而巴特(Roland Barthes)在《文之悦》(*Le plaisir du texte*, 1975)一书中更是直接把文本比喻成身体,指出隐藏在读者身体中的情欲与文本交往之间的色情性质。

形变的发生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这就是阅读活动开启的阈限空间。“阈限(Liminalität)是一种过渡性体验,跨越边界的过程,‘居间(Zwischen)’状态。”(Warstat, 2014: 197)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09年人类学家范·盖纳普对“过渡仪式”的描述中。20世纪60年代,经过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深入阐发,成为一个跨越仪式研究边界,进入戏剧、艺术、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研究领域的理论关键词。因为它从主体感知出发,揭示了一种广泛的以阈限经历为特征的审美体验。伊瑟尔在阐释阅读和理解过程时多次提到“阈限空间”(der liminale Raum),但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它被用来描述读者的一种居间感知体验:从日常环境脱身的主体沉入静默的文字空间,惯常的感知模式受到干扰,被迫进入一种新的体验空间,由此带来心理与情感的起伏变化,以及相应的身体反应(如大笑、哭泣等)。在伊瑟尔笔下,这是一个现实、虚构与想象三者越界混合的生产性、表演性和事件性空间。从述行问题得到充分讨论与认识的今日回看,那就是一个述行的空间,而且形变不仅发生在相对短暂的阅读的阈限时空,还会过渡到永久的现实空间,从个体性的审美体验转变为公共性的社会事件,这就是虚构文本施展出实在效力的过程。

当前德国的文学述行研究中,伊瑟尔揭示的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互活动构成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此之上,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特别研究项目(Sonderforschungsbereich)之一“述行的文化(Kulturen des Performativen)”梳理出文学述行的两个层面:“结构性述行”和“功能性述行”。

结构性述行把关注点放在话语和叙述层面,即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层面。功能性述行则把关注点从文本的结构特点转移到文本的文化作用力。结构性述行探讨的是文本如何说到做到,或者也有可能所做与所称不符,而功能性述行则追问文本引发的效应。功能性述行首先是指文本在与读者交会时施展的效力和动能。其次也指文本的社会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文字文化的产品得以成为述行文化实践的一部分(Häsner et al., 2011: 84-85)。

不难看出,这似乎是一个各种理论和方法跨越交织形成的综合视角,有话语理论所揭示的文本对权力话语的征用与处理(福柯),有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社会能量的循环(格林布拉特),也有与叙事学、互文理论的研究相重合之处。但是它的特异之处也是同样明显:叙述与行动被并置起来,叙述等于行动,叙述指向行动。

首先,叙述本身就是行动,它是叙述内含的结构。对叙述的关注不再落在它所复制的文本以外的世界,而是它如何建构起文本内自己的真实世界。对叙述的考察也不再评价它是否如实逼真,而是发现它使自己显得如实逼真、说服读者的策略;甚至如实逼真也并不重要了,因为空白、矛盾、模糊之类的叙述策略已是公开的秘密。叙述不再仅仅是再现一个行动,而是使自己成为行动,它想方设法跨越时空阻碍、将自己发展成

一股滚滚前行的叙述之流;或许它也并不流动,而是凝固成静默观看的姿势,或是原地重复打转,甚至以“零行动”给自己设置障碍,借以显示行动的荒诞与无意义——这里仅以大家所熟悉的卡夫卡的几种叙述行动为例。叙述有时候懒于搭建自己的行动框架,而是借用现成的程式化行为,例如各种仪式、习俗和日常景象,它们本身就是述行实践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省去一番合理化辩护的口舌。叙述并非自言自语,除了借用戏剧的对话模式让角色之间直接交流,它还暗藏了一种与读者暗中交流的结构,很多时候它并不会直接与读者搭腔或是发出指令,而是挑起读者质疑发问,自我解答。此外,文学叙述的口头性源起赋予它某些口头特征,例如节奏和韵律,只有通过朗读吟诵等身体活动,将文字叙述转化为口头叙述,才能复活其被长久遗忘的身体性,从“非身体化文本”重返“身体化文本”(Fischer-Lichte, 2013: 135)之本源,这一述行趋势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正愈演愈烈。

其次,真实与否不再重要,是否有效才是关键——叙述指向行动。无论文本的开放程度如何,一切叙事都会让读者参与到发现的过程中来。最具挑战性的“可写的文本”(巴特)甚至完全有赖于读者参与文本的建构,它没有提供一个静态的现实,而是邀请读者去参与现实的生产。它也不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决断和行动都掌握在读者手中。叙述指向的行动,绝不只是寻找意义的行动,至少不是某个确定的、独一无二的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体行动。作为述行的阅读发生在从文字媒介到身体媒介转换的阈限空间,身体、感知、意识的共同参与把它演变成一个复杂的认知、想象、情感和动能事件。而且它不仅作用于个体的身体实践,还向社会躯体蔓延,对社会现实施加影响。文学向社会的转化,文学语言对世界的改造,就是美国解构主义大师米勒(J. Hillis Miller)对文学述行的理解。正是因为文学作用于读者个人以及社会现实,我们才能把文学称为行动,才有可能谈论文学的述行性。

3 述行的其他可能

20世纪80年代末在伊瑟尔的后期研究中,“述行”一词突破文学交往模式的框架,成为文学人类学构想的基石。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视角》(1991)一书的末尾小节“模仿与述行”(Mimesis und Performanz)中,伊瑟尔试图借助“述行”视角对传统的模仿论和再现观进行修复补充。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没有述行,便妄论再现。”(Iser, 2016: 481)他认为,早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作为模仿的再现时,就已然包裹进述行的种子,因为亚氏所称的模仿并不只是模仿既存的自然之物,而是认识到自然本身也具有生成性,因此再现并不满足于现实的存在状态,而是以变化为目标,是一个指向变化目标的变化过程,一种外推。在伊瑟尔(Iser, 2016: 484)看来,此种“依靠技艺实现的外推和模仿对象的客体化就是述行行为(performative Aktivitäten)”。没有外推和客体化的述行性再现过程,模仿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行为本身并不是对现存之物的模仿,也不是自然所赋予的,而是展现了对模仿原型的想象力,产生了单纯模仿所无法创造的新事物。不过,几百年来,人们对于再现过程的述行特性视而不见,仅仅围绕着模仿与再现这个等式徒劳打转,述行成为思考的空白点。伊瑟尔决定还是从模仿入手,他在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和利科(Paul Ricoeur)关于模仿的思考中,敏锐地捕捉到再现危机所导致的对模仿的认识变化。

首先,这种变化源于对自然和现实的重新认识:自然不再被视为纯然的存在,而总是被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现实也不再是既定的,而是需要不断自我实现的。因此伊瑟尔(Iser, 2016: 488)提出,对于模仿而言,“无须呈现某种应然(Sichtbarkeit des Seinsollens),而是要让接近的可能变得可见(Sichtbarkeit der Zugänglichkeit)”。也就是说,处于模仿中心的不再是某个客体,而是接近客体的感知通道。模仿从对客体的模仿变成对感知条件的模仿,人的感知行为不仅是再现的条件,参与现实建构,也变为再现的对象,成为被建构的现实。这一发现为理解现代文学艺术开辟了绿色通道——感知与媒介成为核心要素,而非被呈现之物。

至此,模仿被从机械复制的死胡同带离,拐入朝向客体无限靠近的感知通道。贡布里希把视觉世界的再现通道分为三段:艺术家脑海中的图示(Schemata)、图像和观看者实现的部分。利科则回到亚里士多德的

“文学(Dichtung)就是对行动的模仿”,将文学的模仿行动引入三个贯通的世界:预构(präfiguriert)世界、形构(konfiguriert)世界和形变(transfiguriert)世界。把模仿视为过程和行动,而非结果与事实,这本身就是述行视角带来的转变。而模仿的结果也须用一种敞开的视角来看待,它是一种无限的接近(不管有多近),一个有待实现的部分,一次孕育着变数的行动。

再现的述行性把模仿从认识论的辖制中解脱出来,模仿不等于再现,而是一系列再现行为。伊瑟尔(Iser, 2016:493)将此种认识转变的意义总结为“模仿的‘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处于模仿核心的不再是某种坚固的、不在场而又至为本质的客体,而是感知的主体,行动的人,于文学而言则是读者。读者的介入将文学从某种固定的本质演变为一个过程,一次事件;文学作为一个虽虚构但不乏生产力的单位,帮助读者实现从文本阐释到自我阐释、自我认识、自我建构的过程,这应该就是伊瑟尔坚守到最后的文学的人本主义。

金惠敏是国内最早关注伊瑟尔述行理论的学者,他认为伊瑟尔提出的“‘表演’概念可能是一个矫正,它使我们重新思考认知性文学理论的合法性问题”^①(金惠敏,2002:169)。在关于真理的再现问题方面,文学因其虚构性一直备受质疑,甚至被斥为谎言。如今遭到质疑的反倒是真理概念本身,以及关于真理的各种论述,科学的,哲学的,历史的。作为认知工具的语言受到逻辑的武装,一度陷入维特根斯坦式一筹莫展的境地,诚如他所言,真正重要的事物必将沉默不语,人们只能以闭口不谈的方式来描述其重要性。不过,语言的纠偏行动早已悄然开始:索绪尔区分出语言系统(langue)和言语行为(parole),虽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符号与整体语言系统的关系上,但是语言的行动力却被意外地从一种固定结构中释放出来;几乎与奥斯汀提出所言即所行(performativ)同一时期,乔姆斯基区分出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行为(performance),虽然他也同样将目光聚焦于前者身上,强调语言能力先于语言行为,语言行为是语言能力的产物,但是语言行为的无限创造性也由此得到充分论证和认可。最后,还是奥斯汀直接道明“言说即行为”,使语言获得了挣脱维特根斯坦式的悖论与绝望的行动力。对于不可言说之物,除了用沉默来宣告语言的失败,现在也许还可以转向述行——语言的述行和身体的述行。当然,此处的述行概念已经超出,甚至部分颠覆了奥斯汀最初对“述行语”的定义。

首先,述行的语言不是一种描述性、定义性、以再现为目的的严肃语言,或者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所说的能指屈从于所指利益的语言,而恰是被奥斯汀排除在述行语之外的非严肃的、虚构的、想象的、表演的、次生于现实的文学语言,与雅可布森所称的诗性语言有相似之处。“那些最为激烈地反对陈说的文本采用的是这样的话语形式:它拒绝将语言降格为交流工具,它悬置逻辑,在语法结构和句法结构之中嬉戏,变成了一种诗性语言。”(卡瓦拉罗,2013:65)在诗性语言中,能指不再依附于所指,它将自身置于突出位置,通过词语的外形和声音等身体-物质性因素,进行自我表演。虚构性为它卸下再现的重负,想象性赋予它嬉戏的自由,使它得以在现实与幻想的边界登台演出。然而,文学述行除了这些特性之外,还额外关注表演的效果:能指在表演中如何成长为如其显现的样子?能指的表演给观众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一影响是否会波及演出现场之外?而且关于不可言说之物,文学述行从未放弃言说的努力,事实上这些德里达口中的“剩余物”一直处于文学表现的中心,文学述行试图使用各种假设性、试探性、修辞性、演示性的表现模式,借助高度感官性的语言,打通感知通道,在通感中唤起它的形象。文学述行将塑形的双臂无限延伸,指向那不可言说之物,但它并无企图也无可能将它最终攥入手里。这一段关于文学述行的描述何尝不也是一种述行的尝试,也许不能单纯用真值标准来评价它,而是要看它是否有效地唤起了关于文学述行的想象,是否成功赋予它行动的身躯和生命力。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是在解读荷尔德林还是另有所指?为什么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要用小说的形式来阐释自己的理论?

语言的述行并非只是纯粹的语言行为,它也具有强烈的身体性和表演性。这样看来,以动词“perform”为基础进行的造词行为并非奥斯汀的任意之举。因为“perform”的基本词意有三条:(1)做、进行、

① 作者在此篇访谈中将“述行”译为“表演”“操演”。

施行;(2)履行、执行、完成;(3)演出、表演。言语行为理论对“performativ”的理解和运用主要在前两个义项,本文之前的论述也主要集中在这两点。但是,在德里达关于符号运动、伊瑟尔关于文本与读者互动的论述中,游戏与表演的特征也十分明显。伊瑟尔更是频繁使用诸如“舞台”“剧目”等指向表演与戏剧的词汇。奥斯汀虽然将戏剧等文学话语排除在述行话语之外,但是他的举例却不乏夸张滑稽的表演效果。

述行理论的另一员重将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1990: 272)直接声明自己所谓的“性别述行”本身就具有戏剧性、表演性意涵:“戏剧性(dramatic)是指身体不仅本身是物质的,而且还在对某些可能性进行持续不断的物质化。人不单是一具身体,从某些关键意义来讲,人在做自己的身体(One does one's body)。”巴特勒成功将述行理论从语言行为转移到身体实践。在述行视角下,身体不再因为物质性而仅仅被视为刻写意义的平面媒介,而是变成最为唾手可得的的生产媒介,将某些可能性物质化就是身体的生产过程,即一种“赋体”(embodiment/Verkörperung)行为。其结果就是,它赋予某些可能性具体的物质身体,让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起来,从“可视性”和“出乎意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结果都是戏剧性的。此外,身体不仅加工他者,表现他者,还能进行一种自反性生产和自反性表演,因为正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所揭示的,人与自己的身体之间具有一种双重关系:身体实在(Körper-Sein)和身体占有(Körper-Haben)。“身体实在”是人存在的居所,标识着身体的主体性;而“身体占有”则使身体能够被当作客体来操纵,当作符号来使用——沿用巴特勒的思路来说,就是当作角色来扮演。我们的身体,作为最陌生的他者,连同它所隐藏的欲望、情感、暴力以及一切不可名状之意识,在认识和经验统治的世界里沉默不语。在述行视角的启示下,身体,这个一直遭受忽略的最大的现实,也参与到对现实的建构中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身体为媒介的艺术形式在与媒介技术的合力下,展示出比语言更直接有效的冲击力。如果说语言述行还需经历从文字媒介到身体媒介的过渡,那么身体述行的效应似乎更具直接性和直观性。费舍尔-李希特(Fischer-Lichte, 2013: 44)对述行的定义就是从身体出发:“这个概念描述了某种符号性行为,但它不是表达或再现某种业已存在的事实,而是在行为发生的过程中,生成它所指涉的真实。随着行为的进行和发展,这种真实才得以产生。述行行为必须被理解作为一种体现行为(ein verkörperter Akt,通过身体呈现)。”

伊瑟尔在晚期研究中曾对述行寄予厚望,将其视为对认识和经验的有效补充:“当认识和经验作为打开世界的方式不再发挥其作用时,表演作为一种形式便达到其效能的峰值。表演作为一个‘仿佛’范畴提供了进入那些不可知而且也不可经验的事物,例如起点和终点的机会。”(金慧敏,2002:169)从身体的角度来说,述行在此处被译成表演也是合理的。揭示模仿的述行性,让述行与认识、经验平起平坐,这是伊瑟尔对述行理论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发现似乎并没有引起重大回响。之后,德国的述行研究走上了主要由朱迪斯·巴特勒和费舍尔-李希特等人开辟的身体述行之路,大洋彼岸的美国则在被称为“耶鲁学派”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J. 希利斯·米勒等人带领下,经由述行走向解构。

参考文献:

- Austin, John L. 1986. *Gesammelte 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M]. Stuttgart: Reclam.
- Austin, John L. 1979.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Zur Theorie der Sprechakte* [M]. Stuttgart: Reclam.
- Bachmann-Medick, Doris. 2014. *Cultural Turns. Neuorientierungen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M].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 Butler, Judith. 1990.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 [G] // Sue-Ellen Case. *Performing Feminism. 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and Theatre*. Baltimore/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uller, Jonathan. 2000.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he Fortunes of the Performative* [J]. *Poetics Today* (3).
- Derrida, Jacques. 2001. *Limited Inc* [M]. Wien: Passagen Verlag.
- Fischer-Lichte, Erika. 2013. *Performativität. Eine Einführung* [M]. Bielefeld: transcript.
- Frühwald, Wolfgang, Hans Robert Jauss, Reinhart Koselleck, Jürgen Mittelstraß & Burkhard Steinwasch. 1996. *Geisteswissen-*

- schaften heute. Eine Denkschrift* [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Genepp, Arnold van. 2004. *The Rites of Passage* [M]. New York: Routledge.
- Häsner, Bernd, HennigHufnagel, Irmgard Maassen & Anita Traninger. 2011. Text und Performativität [G] // Klaus Hempfer, Jörg Volbers. *Theorien des Performativen. Sprache-Wissen-Praxis. Eine kritische Bestandaufnahme*. Bielefeld: transcript.
- Iser, Wolfgang. 1984. *Der Akt des Lesens. Theorie ästhetischer Wirkung* [M]. München: W. Fink.
- Iser, Wolfgang. 2016. *Das Fiktive und das Imaginäre. Perspektiven literarischer Anthropologie* [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Tambiah, Stanley J. 2002. Eine Performative Theorie des Rituals (1979) [G] // Uwe Wirth. *Performanz. Zwischen Sprachphilosophie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Warstat, Matthias. 2014. Liminalität [G] // Erika Fischer-Lichte, Doris Kolesch & Matthias Warstat. *Metzler Lexikon. Theatertheorie*. Stuttgart u. Weimar: J. B. Metzler.
- Wirth, Uwe. 2002. Der Performanzbegriff im Spannungsfeld von Illokution, Iteration und Indexikalität [G] // DERS. *Performanz. Zwischen Sprachphilosophie und Kulturwissen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伊塔诺·卡尔维诺. 2007.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M]. 萧天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丹尼·卡瓦拉罗. 2013.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雅克·德里达. 1998. 文学行动[M]. 赵国兴,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2002. 阅读史[M]. 吴昌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金惠敏. 2002. 在虚构与想象中越界——沃尔夫冈·伊瑟尔访谈录[J]. 文学评论, 2002(4):165-171.

Performatives and Literature

LI Mingming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word “performativity” has become a theoretical keyword to understand the tur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 few domestic scholars have also noticed this phenomenon. Their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Butler’s theory of gender performance and Yale School’s performativity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reat contribution and promotion of German scholars to the study of performativity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Iser’s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the word “performative”. Combining with the body performance perspective of Fischer-Lichte, a contemporary German expert of performa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 to literary research: what is the perform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texts, why reading behavior is also performative, and what is the performative nature of literary aesthetic experience. Finally, in today’s era whe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re questioned, can the “performative turn” bring us a new direction?

Key words: performatives; body; Iser; Fischer-Lichte

责任编辑:陈宁